

譚 嗣 同

——近代中國啓蒙思想家

楊 正 典 著

市方
五卷

B254

2

湖北人民出版社

譚 嗣 同

——近代中國啓蒙思想家

楊 正 典 著

湖北人民出版社

1957年 武漢

內容提要

譚嗣同是十九世紀末葉中國傑出的資產階級啓蒙思想家，是當時向西方國家尋找真理的先進的中國人之一，他的哲學、社會政治觀點在當時都具有一定的進步意義，在中國唯物論哲學的發展道路上佔有顯著的地位。本書較全面、系統地介紹了他的生平和思想，並給予實事求是地評價。一九五四年，三聯書店編輯出版了‘譚嗣同全集’，本書是研究‘譚嗣同全集’的一本較適宜的參考讀物。

譚 嗣 同

——近代中國啓蒙思想家

楊 正 興 著

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武漢解放大道332號）

武漢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新出字第1號

新華書店武漢發行所發行

建新印刷廠印刷

787×1092 1/32 開 • 2印張 • 1插頁 • 44,000字

1955年9月第1版

1957年4月第2次印刷

印數：6,001—20,000

統一書號：11106·28

譚嗣同像



目 錄

一	前 言	1
二	譚嗣同的生平及其思想產生的社會背景	4
三	譚嗣同思想產生的理論前提	25
	（一）清代經今文學運動的興起與改良主義思想的發端	26
	（二）西方文化的輸入與中國科學傳統	28
	（三）佛學及其他	30
四	譚嗣同思想分析、批判	32
	（一）哲學思想	33
	（二）社會政治思想	44
五	結 語	54
	後 記	60

一 前 言

十九世紀初叶的中國，還是一個經濟落后、生產力極為低微、处在异族統治之下的古老封建國家。而在这个时期，資本主義已經在英國、法國、美國取得了勝利，并向海外尋找市場，开拓殖民地。自从鴉片戰爭以后，資本主義勢力开始侵入中國，小農經濟与家庭手工業合成一体的中國封建經濟結構逐漸解体；随着自由資本主義之轉變为帝國主義，十九世紀七十年代，帝國主義对中國的侵略，已使中國淪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國家，到了九十年代，帝國主義已完成在中國勢力范围的划分，勾結滿清政府，成为中國的实际統治者。

封建經濟基礎的解体，民族資本主義因素的出現，資本主義勢力的入侵，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形成，西方科学的輸入，使得中國社会的面貌与性質起了空前变化，社会各階級階層走向分化；中國封建社会的上層建筑也受到震撼，开始动摇。在帝國主義与封建主義双重压迫下的中國人民，走到了歷史的十字路口；亡國之禍迫在眉睫，改变現狀以求生存成为举國普遍的願望。人民群眾之間潜伏着的革命种子尚未成熟；上層階級在高唱变法維新，想在不触动封建統治秩序的基礎上進行改革，使中國走上資本主義。要清算傳統的思想、文化，要指出中國社会發展的方向，要闡明科学的力量与意义，要在理論上总结四十年代以來啓蒙者的思想成果、喚醒中古的迷夢，这是当时时代所提出的任务。

當時的無產階級還沒有形成自覺的階級力量；農民經常是用自發的起義和革命運動來反抗壓迫，沒有也不可能創立自己的哲學；新興的資產階級在鬥爭中正在成長，尚未形成獨立的代表其階級利益的意識形態。由於封建中國的哲學思想基本上集中在上層社會，所以在貴族士大夫的開明派中出現了以啓蒙爲己任的思想家，來承擔時代所賦予的任務。

正如西歐資產階級啓蒙思想家掌握唯物論作爲新的社會階級的精神武器一樣，反映十九世紀末葉中國新興民族資產階級利益的思想家們，也曾以唯物論的世界觀作爲理論根據向舊中國發出‘要變要新’的呼號，起了‘振聵啓聵’的覺醒作用。

譚嗣同（一八六五——一八九八）——十九世紀末葉中國資產階級啓蒙時代傑出的唯物論思想家，中國封建社會崩潰時期（晚清）的社會活動家、民主主義者、‘可敬的啓蒙思想家’^①。這個曾經影響時代的愛國主義者、哲學家，在舊社會裏是落寞無聞的，並且遭到歪曲。譚嗣同在政治上被當時的人稱爲‘瘋漢’（袁世凱語）或是‘通洋務’的‘世家子弟’^②，在思想方面被後來一些人稱爲‘浪漫主義的唯心論’者^③，‘虛無的觀念論’者^④。爲了認識先進的中國人在救國運動、思想戰綫上的勞績及其思想的歷史意義，繼承前輩思想家的遺產中的優秀部分，今天必須對他重新批判，予以正確估價，拭去其思想上的封建糟粕和宗教雜質，使這類‘晚清思想界的彗星’^⑤發出光芒。

① 陳伯達：‘真理的追求’續集，生活書店一九三九年版，第一七九頁。

② ‘戊戌變法’（翁同龢日記）卷一，神州國光社一九五二年版，第五一七頁。

③ 向林冰：‘譚嗣同哲學的再評價’，‘理論與現實’二卷二期，生活書店一九四〇年版。

④ 侯外廬：‘近代中國思想學說史’，生活書店一九四七年版，第七七三頁。

⑤ 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商務印書館一九三四年版，第一五〇頁。

譚嗣同的唯物論思想，表現在他的主要著作——‘仁學’中（譚嗣同死後在日本出版，滿清統治者還列為‘禁書’）。這本書是一篇充滿鬥爭精神與自由思想的社会改革綱領，表達了中國人民對於異族統治者的深刻仇恨，反映了新興資產階級的要求與願望，對於孫中山所領導的推翻滿清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運動，起過一定的激勵作用。譚嗣同思想對於二十世紀初中國解放運動進步活動家們（陳天華、吳稚暉、鄒容）觀點的確立，發生了巨大影響。近代中國民主主義教育家蔡元培對於譚嗣同的言行，也曾表示了高度的欽佩與贊仰^㉑。

譚嗣同思想的啓蒙意義在於：在與占統治地位的儒家傳統思想作鬥爭中建立了唯物論世界觀，並以之作為思想武器，作出反對君主專制和異族壓迫的結論；以具有辯證法因素的思想方法，駁斥復古守舊的思想，得出變法維新的結論，指出了資本主義的社会远景；猛烈地攻擊了封建的倫理道德，重新估價了傳統的文化、思想。他的歷史功績是：促進了人們民族意識的增長，加速了封建制度上層建築的崩潰，在意識形態方面散布了資產階級的民主、自由的觀點，為即將到來的革命啓發了人們的頭腦。

蘇聯的學術界和哲學家們對於譚嗣同的思想成就給予了極高的評價：‘他具有唯物論的傾向，並且充滿了向封建的正統思想戰鬥的精神。’^㉒‘譚嗣同的唯物主義學說中滲透着堅決反對封建主義的思想；他的學說是改良派左翼在反抗滿清皇朝的鬥爭中的理論基礎。’^㉓

作為近代啓蒙者之一，譚嗣同思想具有極大的進步意義，在中國近代思想發展史上譚嗣同占着重要地位。

㉑ 蔡元培：‘近五十年來之中國哲學’。‘申報月刊’一九二三年二月號。

㉒ 蘇聯大百科全書，第二一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三年版，第二七三頁。

㉓ （蘇）羅森塔爾、尤金編：‘簡明哲學辭典’，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五年七月版，第三〇頁。

二 譚嗣同的生平及其思想產生的社會背景

十七世紀中葉，處在氏族制末期的滿族部落，侵入中國，勾結漢族封建勢力，建立起君主專制的封建國家。由於滿族的人口過少，文化落後，滿清王朝爲了統治具有悠久文化和革命傳統的以漢族爲主體的中國人民，在經濟、政治、文化各個方面，施行了一系列掠奪、摧殘、恐怖、鎮壓的統治政策，因而使得中國封建社會的歷史進入逆轉階段，中國人民長期陷於黑暗的民族牢獄之中。滿清王朝對外一直採取嚴格的閉關海禁政策，正如馬克思所指出：‘推動這種政策的更主要的原因，就是清朝害怕外國人會扶助很大部分中國人在十七世紀前半期或大約在這時期內所有過的那種不滿意滿洲人奴役他們的情緒。’^①而中國封建社會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又支持了這種落後的政策並爲其實現提供了客觀的可能。建立在民族矛盾和階級矛盾之上的滿清政權經常處於動盪不安的局面，中國各族人民尤其農民羣衆反抗異族統治的鬥爭始終沒有間斷過，封建社會的危機在日益發展深化中。

十九世紀四十年代，西方資本主義勢力東來，改變了中國歷史的面貌與性質；‘清朝一遇到英國的槍砲就喪盡了自己的聲威，迷信“天朝”萬古不朽的這種幻想也就消失了，與文明世

① ‘馬克思恩格斯論中國’，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三年版，第四八——四九頁。

界隔絕的那種野蠻的絕對的閉關陋習也被打破了’^㉞。鴉片戰爭的失敗，意味着中國封建社會的結束與半封建半殖民地時期的開始。四十年代到六十年代是半殖民地中國的形成期，兩次對外戰爭的失敗，中國與英、美、法、俄分別訂立了一連串的不平等條約，一切侵略國都在中國取得了‘最惠國’的特權，滿清王朝由盲目的排外一變而為屈辱的媚外了。

在深刻的社會危機中，一八五〇年爆發了著名的農民起義運動——太平天國革命，這便是鴉片對中國所起的‘驚醒作用’^㉟。作為中國民主主義革命序幕的太平天國革命，雖然取得了光輝的勝利，動搖了滿清王朝的封建統治，但由於農民運動本身的弱點和缺乏工人階級的領導，在滿清王朝與外國侵略者的聯合進攻之下，太平天國革命終於在一八六四年以失敗而告終。

在這時期，外國侵略者決定保存這個腐敗的王朝作為自己的代理人，同時使中國更加殖民地化以便利、擴大其侵略活動，滿清政府則公開賣身投靠於西方列強與中國人民為敵以保全其封建統治，中國人民與封建主義帝國主義之間的矛盾在與日俱增中。

這是譚嗣同出生以前中國社會的簡略圖景。

一八六五年三月十日，譚嗣同出生於北京。他的家庭是官僚地主階級成份，是封建社會裏的所謂‘書香門弟’，他被當時人稱為‘世家子弟’，他的曾祖父、祖父都是有‘功名’受‘冊封’的地方紳士。他的父親譚繼洵更是典型的封建時代‘學而優則仕’的朝廷命官，由賜進士出身而戶部員外郎、甘肅布政使，最後升任湖北巡撫，成為封建統治集團的二品官員。他父親在維

㉞ ‘馬克思恩格斯論中國’，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三年版，第四〇頁。

㉟ 同上書，第一七二頁。

新運動時期，曾經‘提倡新政，不遺餘力’，算得是當權派中的開明分子。

譚嗣同原籍湖南瀏陽，他出生之年正是他父親作爲一個地主階級知識分子挈眷入京、尋求功名參加科舉的時候。譚嗣同的家世出身，對於他的思想的形成尤其他的社會政治活動，有直接的影響。與所有封建時代知識分子一樣，譚嗣同少年時代也接受着塾師和家庭兩方面的教育。十歲的時候，他父親聘請同縣的歐陽中鵠在家中設館教他，這已是他的第三個塾師。這位歐陽先生就是現代戲劇家歐陽予倩的祖父，在當時是位思想開明的知識分子，也曾做過封建小吏，對於譚嗣同思想的形成，有積極作用，後來還參加了湖南的新政運動，成爲譚嗣同的同志。譚嗣同少年時代，在家庭受到‘父慈母嚴’的教育，養成了‘倔強能自立’的性格；十二歲時，北京流行白喉傳染症，他的母親、哥哥、姊姊都染病在五天之內相繼死去，他自己也病得死去活來，因此他父親又叫他‘復生’。童年時代的家庭變故給予幼小的心靈以很大刺激。此後，他在庶母的虐待歧視下過着毫無溫暖的家庭生活，他自稱‘吾自少至壯，遍遭網倫之厄，涵泳其苦，殆非生人所能任受’。官僚家庭裏尊卑上下是很嚴格的，這種束縛人性的生活在他思想裏早就滋長了反抗封建倫理名教的種子。

一八七七年，譚嗣同的父親作甘肅布政使，由於‘隨父赴任’，從一八七八年至一八八九年十一年間，他五度往返於蘭州長沙之間，以後又遠遊全國其他各地，足跡遍‘直隸、新疆、甘肅、陝西、河南、湖南、湖北、江蘇、安徽、浙江、台灣各省；察視風土，物色豪傑’^⑤，擴大了眼界，增廣了見聞，使他在安

⑤ 梁啟超：‘譚嗣同傳’。‘譚嗣同全集’，三聯書店一九五四年版，第二一頁。

土重遷的封建社會裏能够得風氣之先，成爲‘瀏陽士子’心目中‘最能通達中外形勢的人’。

少年時代的譚嗣同，表現了獨特的性格和學習的毅力，‘他於文事之暇，喜觀技擊，會騎馬，會舞劍’，自稱‘弱嫻技擊，身手尙便’；他‘五歲受書，卽審四聲，能屬對，十五學詩，二十學文’。譚嗣同在詩文方面得到了高度的成就，且有不少激昂慷慨的作品，賦詩明志，才氣縱橫，以‘生平慷慨悲歌士’自況；他的‘罌粟米囊謠’、‘六盤山轉饒謠’、‘有感一章’等都是富於人民性和具有感染力的。他的‘少有馳騁志，愁看髀肉生’（見‘馬上作’），‘一朝馬革孤還日，絕勝牛衣對泣時’（見‘漢口別仲兄’）的詩句，更表現了一個處在‘萬方多難’中的愛國青年的雄心壯志。至於‘網倫慘以略私德（印度社會等級），法令盛於巴力門（英國議院）’（見‘金陵聽說法三首’），以新事譯詞入詩，以及他對於晉代詩人陶淵明的不同於已往的評價，都表現了他的富於創造性的文學觀點。

‘性不喜詞，以其靡也’。譚嗣同的性格是剛強的，他的詩文不同於一般封建士大夫僅爲遣興寄懷而作。在他參加了社會政治活動之後，文學就成了他表達哲學觀點、闡述科學知識、宣傳民主思想的有力工具。他在三十歲以前完成的詩文著作，已有十六種二十四卷。

譚嗣同雖然也曾受到早期改良主義者的思想先驅如龔自珍、林則徐、魏源等人的影響，並且接受了一些由西方輸入的新思想，這些新思想的來源不外兩個方面：江南製造總局繙譯館和基督教廣學會所出版的介紹西方科學的書籍，以及早期的官僚地主階級中受過西方資本主義影響的知識分子馮桂芬、薛福成、陳熾等人的著作，這些思想給譚嗣同的影響是主要的。但是譚嗣同同樣用了不少的時間和精力來學習我國傳統的古代

文化典籍，在這方面他同樣表現了很高的智慧，我國古代的文學、歷史、哲學、考據，他都會進行過深入的鑽研。尤其難能可貴的是：他採取了批判的態度接受古代文化遺產，並且繼承了古代進步哲學家從墨子、王充、張載、王船山……以來的思想遺產，他在著作中曾多次地對這些先進的思想家致以讚仰，這對於他的唯物論世界觀體系的成長，起了奠基的作用。不過，他在接受我國優秀文化遺產方面也走了一些彎路，浪費了不少時間：‘三十前之精力，敵於所謂考據辭章，垂垂盡矣，勉於世，無一當焉’。這就是他的回顧與自悔。

譚嗣同在一八八四——一八九四年之間，‘十年中至六赴南北省試’，並且屢試‘不第’，功名場中的失敗，說明了他的學問‘不合時宜’。科舉本是封建統治者一貫用來統治文化、桎梏思想的工具，先進的思想家們在這方面未能免俗的嘗試往往是失敗的，例如比譚嗣同早一個世紀的啓蒙思想家、唯物論者戴東原就曾經六次參加進士考試而落第，所以，譚嗣同對於‘八股’、‘時文’抱有深刻的憎恨。

譚嗣同對於科學表現了高度的熱愛與虛心學習的態度，比起當時一般盲目排外的‘腐儒’確是先進得多。在他的讀書筆記裏面記載了許多關於數學、天文、地質、物理方面的知識，並提出了自己的意見。其中有兩點值得注意的地方：首先他對於中國古代的科學傳統予以重視、繼承，例如他指出關於地球運動說、地圓說，我國古已有之，並且引用‘內經’、‘周髀算經’、‘尚書’，以及漢代、宋代的唯物論者王充、張載，元代天文學家郭守敬的理論來證明；另一方面，他以實踐來印證理性知識，例如他以實地觀察的結果證明‘涇濁渭清’相沿之說的錯誤，以及我國古代科學類書‘爾雅’中所記載‘鳥鼠同穴’的動物共生現象的實際情況。譚嗣同唯物論哲學思想的建立與他的科學基礎

是分不開的。

一八九五年，譚嗣同三十歲時，是譚嗣同的思想轉變時期，他對於過去所從事事的‘考據箋注金石刻鏤詩古文辭之學’，決心‘悉棄去’，而致力於‘究心泰西天算、格致、政治、歷史之學’，這是他走上社會政治舞台的思想準備。他以漢代進步思想家揚雄的話‘雕蟲篆刻，壯夫不爲’自勉，認識到‘處中外虎爭文無所用之日，丁盛衰互紐膂力方剛之年’，不應該把大好時光浪費於‘無用之呻吟’。青春的活力，愛國的熱情，鼓動着譚嗣同不甘心苟安於‘世家子弟’的生活，急欲奮發有爲，爲了表示自己的決心，因又自號‘壯飛’。

譚嗣同的轉變並不是偶然的，這是當時動盪的社會生活、尖銳的階級矛盾、深刻的民族危機對他的刺激和影響，以及他個人生活體驗、學習感受的必然結果和集中反映。

* * *

十九世紀六十年代到八十年代，是西方列強國家由資本主義向帝國主義階段轉化的時期。自從太平天國革命被鎮壓失敗以後，外國侵略者與滿清政府的關係在軍事合作的基礎上日益親密了。在列強的支持下面，封建統治者開始所謂‘洋務運動’，幻想藉此‘中興’、‘以夷制夷’，這就是用來欺騙人民的所謂‘自強’的‘新政’；帝國主義爲了幫助滿清政府鎮壓人民革命，並使滿清政府更符合他們傾銷商品、掠奪原料的需要，也把電報、鐵路、輪船、槍砲一起輸入到中國來。這時候，西方列強已經通過扶植中國封建統治勢力以鎮壓中國人民的方式而成爲中國的主人，建立起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統治秩序。‘帝國主義和中國封建主義相結合，把中國變爲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過程，也就是中國人民反抗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過程’●。酷

● ‘毛澤東選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版，第六二六頁。

愛自由，具有革命傳統的中國人民，在反封建反殖民奴役的鬥爭中表現了無比的英勇，並且認識到帝國主義是新的更大的敵人。

資本主義經濟的出現，給中國歷史帶來新的內容與意義。

‘中國封建社會內的商品經濟的發展，已經孕育着資本主義的萌芽，如果沒有外國資本主義的影響，中國也將緩慢地發展到資本主義社會。外國資本主義的侵入，促進了這種發展。外國資本主義對於中國的社會經濟起了很大的分解作用，一方面，破壞了中國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的基礎，破壞了城市的手工業和農民的家庭手工業；又一方面，則促進了中國城鄉商品經濟的發展。這些情形，不僅對中國封建經濟的基礎起了解體的作用，同時又給中國資本主義生產的發展造成了某些客觀的條件和可能。’●毛主席這一段話，對於近代中國資本主義發生、發展的歷史過程，作了明確的分析和概括。

早在鴉片戰爭以前，中國資本主義萌芽，在廣州一帶沿海城市就已經出現，但是在封建制度下面城市工商業、手工業工廠是得不到發展的。鴉片戰爭以後，由於外國資本主義的入侵，一方面破壞了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基礎，另一方面促進了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十九世紀中葉，就開始有一部分商人、地主、官僚投資於新式工業，到十九世紀末期，在福州、廣東、上海、武漢等地建立了製茶、造紙、紡織、機器等工廠，中國民族資本主義開始有了初步的發展，這些新出現的資本主義因素，~~是低級級的~~，並且一開始就受到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壓制。~~和壓迫~~，英國報紙曾公開提出‘阻止華人設局開廠’，而封建統治者則採用了官辦、官督商辦、官商合辦的方式來限

● “毛澤東選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出版，第六二〇頁。

制、打擊新生的資本主義。不過，在中國封建經濟解體的過程中，在中國社會階級、階層的分化中，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經濟畢竟是漸漸成長起來了。

前所未有的資產階級出現後，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國的社會矛盾表現得更為複雜深化；這時候，新生的資產階級開始從比較開明的官僚、地主、商人中間提出了自己的代言人，這些人都是在某些程度上接受了西方資本主義影響的知識分子，他們採取著書立說的方式，一面向上層社會介紹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社會情況，一面向封建統治者傳達新生階級的政治（經濟）要求。例如：五十年代時期的林則徐（‘華事夷言’）、魏源（‘海國圖誌’），八十年代的馬建忠（‘適可齋紀言’）、薛福成（‘籌洋芻議’），九十年年代初的陳虬（‘救時要義’）、鄭觀應（‘盛世危言’）……等人，他們都先後提出了：學習西方文明、發展民族工商業、改革封建政治的‘富國強兵’、‘消除外患’的政治主張與具體建議，雖然他們思想的進步性在程度上有所不同，雖然他們都具有觀點模糊、態度軟弱、立場動搖的共同缺點，但是這種要求民主、宣傳科學的議論，却使古老中國的社會視聽為之一新。這是近代中國資產階級改良主義思想興起的過程，‘戊戌維新’便是它的頂點與總結。

十九世紀九十年代，西方資本主義國家進入最後階段——帝國主義，其特徵是壟斷代替了競爭，資本輸出較之商品輸出具有更重要的意義，侵略的形式帶有更多的獨佔性，世界市場這時已被列強瓜分殆盡，於是地大物博經濟落後的中國成為帝國主義爭奪的焦點；除了英、俄、德、法等國外，後起的美國、日本的侵略魔爪也伸入中國。中日戰爭失敗後，帝國主義開始了劃定‘勢力範圍’、進行瓜分中國的陰謀活動。（帝國主義‘勢力範圍’的劃分：英國——長江流域各省。法國——廣東、廣

西、雲南。俄國——東三省、蒙古。德國——山東。日本——福建、南滿。）列寧曾指出：‘歐洲各國政府已經開始瓜分中國了。……他們偷竊中國就像從死屍身上偷竊東西一樣’[●]。在嚴重的民族危機面前，向資產階級轉化的地主階級和一些受資本主義影響的官僚、知識分子們紛紛發出了變法維新的呼聲。四十年代以來的資產階級改良主義思想，形成爲一種政治運動的客觀條件已經成熟了。

譚嗣同就在這個時候，走上了十九世紀末葉的中國社會政治舞台。

十九世紀八十年代末，新生的資產階級的代言人開始採取直接上書的方式，向封建統治者正面提出變法維新的要求。一八八八年，康有爲曾上書滿清皇帝：‘下詔罪己，變法求治’。一八九三年，還停留在改良主義階段的孫中山，也曾上書宰相李鴻章：‘仿行西法，以籌自強’，並提出‘人盡其才，地盡其利，物盡其用，貨暢其流’的改革方針。在滿清的高壓政策下，直接上書當道反映出變法維新的思想已有廣泛的社會基礎，並且即將形成一個運動。

一八九五年‘馬關條約’的簽訂，激起了全國人民的憤怒；康有爲又在北京聯合各省會試的考生（舉人）一千三百餘人聯名上書：‘拒和、遷都、變法’；萬言書雖未被皇帝看到，這一聚衆請願的事件却成了維新運動的導火綫。這時候，變法的思想已在統治階級內部一部分感到危亡可待的人中發生了影響，康有爲倡辦的‘強學會’、‘萬國公報’曾得到一些朝廷官吏的贊助，並在上海成立了‘強學會分會’，雖然僅僅四個多月的功夫就被滿清政府的當權派以‘私立會黨、顯干例禁’的藉口予以

● ‘列寧斯大林論中國’，解放社版，第一七——一八頁。